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敌人论

左高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敌人论

左高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杨宗元
责任编辑：罗 晶
装帧设计：肖 辉 彭莉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敌人论/左高山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0-22570-8

I. ①敌… II. ①左… III. ①本体论-研究 IV. ①B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090 号

敌人论

DIREN LUN

左高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80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

字数：361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300-22570-8 定价：89.00 元

邮购地址 100080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 62515195 8250176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致 谢

本书的完成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运思到成书耗时近十载，它能有幸面世，得益于我的老师、同事、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他们的情谊让我倍感温暖并心怀感激。在我的学术之路上，有三位老师的风范和教诲令我铭记并促使我下决心以学术为业。其中，俞可平教授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他要求我做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他认为年轻学者不仅应该具有信念，而且更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鼓励、支持和肯定是我完成这部著作的动力。万俊人教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关于敌人问题的一些想法和基本框架在博士论文《政治暴力批判》中有过初步阐述，也吸纳了万老师的真知灼见。拙著能够顺利出版，是万老师不遗余力推荐的结果。李建华教授是我的学术启蒙导师，自攻读硕士学位始，他就关心我的成长，甚至经常给我灌输“你天生就是一名学者”的“米汤”，并嘱咐我心无旁骛地做有价值的即使是“非主流的”学术研究。我衷心感谢三位恩师的栽培和提携，但本书存在的问题与他们无关，文责由我自负。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白钢教授，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高度肯定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孙津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中央编译局的何增科教授、李惠斌教授、曹荣湘教授、董莹老师的帮助；感谢曾钊新教授、吕锡琛教授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给我提供的访学机会；感谢唐文明、李义天、蒋美仕、彭定光、李侠、尚东涛、包雅钧、张伟、雷良、谭忠诚、周谨平、张言亮、阎健等好友对我的帮助；感谢在美国访学期间吴定会、张祥建、秦

涛、邓久根、廖思阳、徐佳佳、涂永前、易存国、张中宁等好友在我因为饥饿而感受到自我存在时，雪中送炭所赐予的美食；感谢我的学生袁超、唐俊、杨颖、王京京、彭勃等提供的帮助；感谢中南大学升华学者特聘教授项目的支持；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再次给予全额资助，让我有机会在美丽的丹佛安心研究并完成本书的修改。

感谢出版家的宽容给了我不断思考和完善书稿的机会，特别感谢李艳辉女士几年前大胆地接纳了这部书稿；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女士的信任和鼓励，感谢陈石军先生耐心细致的编辑工作，感谢罗晶编辑纠正和减少了书稿的错误。

感谢 2015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匿名评审专家，他们严苛的审阅和中肯的评审意见减少了本书可能存在的瑕疵，也感谢他们慧眼识珠让本书有机会入选文库。

感谢芝加哥大学张学杰教授、张小琼女士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访问芝加哥大学，并静心修改书稿。

感谢父母为我操持家务，减轻了我的负担，父亲因为“敌人”而落入社会最底层，但他始终积极乐观地与命运抗争，鼓励我们朝前看并且要我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感谢妹妹妙芳和弟弟高峰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夫人张小玲多年来对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支持。在我清贫落魄时，她与我共度时艰、无怨无悔；在我春风得意时，她及时冷水浇头让我保持清醒。如果没有她的理解，或许我就只能做非常美好但无法实现的“学术梦”了。

序一

俞可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相信，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段著名的“毛主席语录”，许多人可能至今仍会背诵这段“毛主席语录”。

对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来说，不明白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就意味着不清楚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依靠的同盟，那就必然不可能取得武装夺权的胜利。所以，区分敌友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也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对长期从事残酷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敌我意识、敌情观念、敌友判断也随之成为党的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深入到每一个老党员特别是老一代党员领导干部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统的内在要素之一。敌友观念至今仍然是影响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刻的意识形态观念之一，判断并且打击“敌对势力”，仍然被列为执政党的重要政治任务。

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中共的工作重心将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由此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共这一工作重心的转变，实际上

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是现代政治学的两个重要范畴，两者有着重大区别。革命党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而执政党的主要目标则是维护政权。革命党的工作重心是政治斗争，执政党的工作重心则是经济发展。革命党主要依靠暴力手段和政治运动夺取政权，执政党则强调用民主手段和法律手段执掌政权。在区分敌友的标准、界定敌友的范围、对待敌友的态度、处置敌友的政策等方面，革命党与执政党也有着重大区别。

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极为深刻的教训。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把50多万知识分子错划成右派，当作政治上的敌人加以打倒。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更甚，不仅大量的知识分子而且大量的党政干部、工人、农民也被划为“阶级敌人”。这些政治运动既给那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也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惨重损失。为何把如此众多的公民打成了“阶级敌人”，并且以残酷的手段对“阶级敌人”进行镇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革命党的敌友观，却缺乏执政党的敌友观。甚至没有人从执政党的角度认真研究过敌友理论。

系统地研究敌友问题，不仅对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左高山博士的《敌人论》是研究敌友问题的一部开创性著作，他在此书中对“敌人”概念在古今中外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做了细致的考察分析，并且努力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来阐述“敌人”的意识形态意义，为国内政治学界进行更加深入的敌友研究开了一个好头。伟大的政治家不仅要避免四面树敌，而且要善于化敌为友。此书不仅值得政治学同仁阅读，也值得有兴趣的党政干部阅读。

2016年1月2日于京郊方圆阁

序二

万俊人

一、引子：左高山的政治哲学三部曲

在诸多人类事务或人类问题中，大概没有什么能比诸种纷繁复杂的人类关系及其料理更为麻烦因之也更让人类自身难分难解的了。就人类关系本身及其料理而言，政治关系及其料理大概又是所有人类关系中最严肃也至为严厉的一类。政治因为斗争、战争、暴力、敌人一类的问题而变得极端严肃，或者说，诸如战争、暴力和敌人一类的问题因为政治才得到严肃的思考和料理，它们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人类关系出现了极端的政治紧张和政治断裂，而且也产生了对政治关系展开哲学反省的需要，因为任何政治紧张和政治断裂都是人类社会的不幸，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之。这便是政治哲学何以必要的根本原因。

在所有极端性的政治话题中，“敌人”大概是最为严肃也最为复杂的话题，因为“敌人”的出现几乎彰显了政治关系之张力的极限。事实上，探究和反思人类的政治关系——更不用说敌人问题——绝非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除了职业政治家、政治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外，大概很少有人愿意涉猎这一问题论域，平常如此，若遇非常之境或非常之时，这种意愿便更为罕见。当然，想涉足政治领域甚至欲在政治领域里成就人生辉煌的，从来就不乏其人。按照马斯洛需求心理学的解释，追求人生卓越乃是人的最高心理需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险峰峻极，好凭观远岸流霞。可是，若

放心纠结于政治事务和政治关系问题的哲学反思，只求政治之哲思而弗求政治之业成，却不仅仅是最难达成人生卓越反而会累及甚至危及自我人生的事情。职是之故，古今中外真正乐于投身——更遑论献身——于政治哲学者确乎鲜矣！更何况潜心琢磨“敌人”这一极端主题乎？

然则，不知是由于自家身世之故，还是其自身学术性格使然，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门下左氏高山君自入室以来，便义无反顾地直奔政治王国，放言诸如战争、暴力一类的政治主题，其气概颇有几分氏祖季高将军策马纵横的影子。眼下，他又将这部沉甸甸的《敌人论》书稿摆上了我的书案，让我瞠目之余，感慨不已！高山君终于完成了他曾经告诉我的政治哲学三部曲：从《战争镜像与伦理话语》（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到《政治暴力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到这部《敌人论》（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高山君可谓是层层逼进，步步为营，不只是在一般的政治生活世界而且是在政治生活世界的最险峰处长袖起舞，厉剑高歌。如果说，《战争镜像与伦理话语》作为高山政治哲学初步之作还略显青涩的话，那么《政治暴力批判》则已颇具“十年一剑，一鸣惊人”的不凡气象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教育部主持第六届全国高校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会上，负责伦理学成果评审的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翟振明教授会后告诉我（备注：其时我被莫名其妙地安排成为中国哲学成果评审组的负责人），《政治暴力批判》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创新之作，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该书最后从获奖名单中被“撤下”，但作为亲自指导过这部作品的所谓“博导”，我仍然抑制不住心底的自豪。当年，高山的博士大师兄唐文明在完成并出版其博士论文《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与现代性批判》时，我曾经对文明君说过：“在学术的海洋里，你已经是足以浪遏飞舟的游泳健将了。”如今，高山君似乎在为我再现曾经的景象：他不仅成就了让方家“印象深刻”的《政治暴力批判》，又在博士后及随后的教研期间完成了这部让我击节叫好的《敌人论》，怎不让我豪情复起，感慨重来？

从“战争镜像”的政治伦理透视开始，高山君洞开了“政治暴力”的真相和本质，进而直抵“敌人”这一具有价值判断之绝对性意义的关键理念之根部，将其政治哲学探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多少了解其前两部曲的“基调”和“旋律”，我对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便格外关注，简直是充满

诸多好奇和绵绵联想。因此，当高山君请我为之一序时，即令我眼下诸事缠身，也还是有条件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我的条件是：当且仅当他的硕士生导师李建华教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俞可平教授都能为此书作序时，我之序才可忝列其中，且仅作唱和而已。

不过，至今我还不十分清楚为何高山君将自己的政治哲学三部曲主题聚焦于战争、暴力和敌人这三个最具政治张力的议题。我只是猜测，他或许也属于“无所不用其极”的问学求道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可谓极端政治或政治极端；暴力——更确切地说，政治暴力——是最严厉的政治行动；而敌人及其存在则恰恰是战争和政治暴力得以合法实施的正当理由。战争是政治暴力的一种最具高度、广度和深度的综合体现，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暴力；政治暴力诚然不只限于战争，但战争却以最充分也最彻底的方式展示着政治暴力的内涵，而战争和政治暴力都直接关乎“敌人”这一极端政治化的行动客体（对象）。如此看来，战争、政治暴力和敌人之间原本就是“三位一体”式的政治主题化对象，欲探究其中之一，必牵涉其他二者。易言之，关于其中任一主题的研究都不可在忽略或离开其他二者的情况下达于充分完备。看来，高山君深谙此中深意，故有他如此这般的政治哲学之三部曲谋划。只是此序单为《敌人论》而作，虽不能不借助于高山君政治哲学三部曲的前两部，但终究只能聚焦于他的最后一部而言其他。

读过《敌人论》书稿，我所得所感甚多，其中思虑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敌人何以产生？其次，倘若真如施米特所言，敌友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甚或唯一根本的政治关系，那么对政治哲学来说，敌友之间究竟如何料理？敌友之外又当如何理解？最后，作为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关系，敌人与朋友之间的政治紧张是否永远无法消解？若能，又当如何消解？很显然，即使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人类也不愿意永远生活在敌友关系的持续紧张中而无以逃遁！

二、敌人何以产生？

人类何时开始出现“敌人”和“友人”的分别，并开始产生敌友之间的分别意识？这样的提问或许太过笼统以至于根本无法回答。但提出这一问题

之所以仍有意义，在于某种形式的历史回溯多少可以提醒我们，作为生命同类，人类其实并不一定同道，关于我们自身生命本性的认同也并不能确保我们的意识相同，行为一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一书中，通过考察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早期社会演进，揭示了人类从氏族到胞族再到部落，继而从部落进至部落联盟（民族的雏形）的组织体系发育中政治观念的产生。他尤其关注和分析了人类家族制度——从血缘婚姻家族→伙伴婚姻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专偶制家族——的历史演变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原初影响。因为生命绵延的血缘关联，亲缘关系（affinities）大概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在亲缘关系中，人类群体尚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最差也只会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差异或者隔膜。人类考古学和史学的研究都充分表明，敌人的最初出现与家族及其分化关系不大，与氏族和民族（摩尔根意义上的“氏族联盟”）的群体分化和利益竞争密切相关。随氏族、民族的分化而产生的利益争夺或战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敌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冷兵器、军事（武士、军队和战争）和政治组织亦即国家。对利益的争夺才是产生敌人和敌友关系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了敌人，才有了政治。或者反过来说，政治的诞生见证了敌人的产生和存在。在政治与敌人之间，有一种可以互换的建构与被建构的关联。用左高山的话说，“敌人”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敌人是被建构出来的。

可是，被建构出来的“敌人”并非被雕刻出来的雕像，一经雕成便难以改变。《敌人论》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所关心的，不只是作为真实的敌人存在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而且还要且更重要的是要追问被建构出来的敌人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敌人”观念的。凭借耐心仔细的词源学梳理，作者发现，尽管原始意义上的“他者”、“异己者”、“敌手”、“对抗者”等含义并未完全消失，但在历史的演化中，一些原有的意义从“敌人”概念中渐渐隐退或者流失，一些新的意味则在不知不觉的时间流动中被添加进来，还有一些概念意义本身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这些词源意义的变化本身，因为无论“敌人”的概念变或者不变，真实的敌人就在那里。问题的意义在于：为什么被建构起来的“敌人”总在变化之中？高山君认为，国家需要敌人来确认其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或许我们还可以

说，敌人更需要国家来确认其政治含义和政治界限。问题是，有国家内部的敌人也有国家外部的或者国际的敌人，还有不同政治党派、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敌人，甚至于，因为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战争，使得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最糟糕的是，谁也无法担保今天的朋友不会变成明天的敌人！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或者抗日战期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和抗日战争之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与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与美国；最后也是最复杂难解的，是所谓“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之著名外交论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谁能告诉我们，敌人与朋友为什么会如此变动不定？究竟哪一个敌人更真实？敌人的这种变动不居是否意味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帕默斯顿勋爵式的政治论断已然成为千真万确的政治真理？最终可否哲学地追问一句：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所谓“政治真理”？

三、敌友之间和之外！

敌人的产生及其身份的相对性一方面来自“敌人”在政治世界或政治时空中的变动不居，另一方面则来自我们熟悉的敌友关系之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在政治学尤其是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敌人常常是相对于朋友而言的，这使得敌友关系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没有朋友便没有敌人，没有敌友关系便没有政治和政治哲学。

人类社会史告诉我们，人类对敌友关系的确认首先是通过自我与他者（他人）的分别而得以建立的。事实上，作为敌人的他者最初被视之为野蛮人、陌生者、异己者，尔后被一步步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类型化为特定类型的敌人，如“敌手”、“阶级敌人”、“人民公敌”、“民族之敌”或“国家的敌人”、“人类的敌人”，等等。“敌人”类型的不同，使得所谓“敌友关系”的含义也不一样。野蛮人既是对外来者、入侵者或者陌生者、异己者的伦理定位和政治蔑视，当然也就是对自我的主体性身份、主体的道德优越性位势和自我在特定之自我—他人的伦理关系中所处的主动或主体乃至主宰地位的自我标榜。然而，这仅仅是自我的单方面自诩而非对方的确认，更何况，当处在自我与他人之关系中的一方产生如此这般的关系和身份意识

时，另一方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如此这般的关系和身份意识。通俗地说，当你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时，你自己已然被对方当作了敌人。当然，人类早就明白这其中的关系置换和身份转换的秘密，并找到了有效的方式将之确定并长久固定下来，这就是所谓人类社会的进步或发展的标准：凡处在落后之发展状况中的人群都被那些处在相对先进或发达状况中的人们或明或暗地确认为野蛮人。而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处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对方视为他者、陌生者、异己者。这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胚胎，但终究还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本身。

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首先严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便团结人民和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抽象或者剥离，敌人不再是一般化的野蛮者或他者，而是被严格地、分门别类地“锁定”：党派的敌人被归类为“政敌”或“阶级敌人”，国家内部的敌人被归类为“人民公敌”，而国家外部的敌人则被归类为民族和国家的敌人。无论以党派或阶级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抑或以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敌友关系都被因此而赋予了最严厉的政治意义，不容任何含糊。而且，经过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敌友关系的处理也采用了最严厉的政治方式：通过诉诸法制惩罚、政治斗争，甚或政治专政、政治暴力直至战争，来消除或消灭敌人。政治家们不必用太高的智慧就可以发现，把握好敌友关系并运用好诸种处理敌人关系的方式或手段，不仅可以强化国家的内部治理，而且通过发现甚至建构国家外部的敌人，转移或者汇聚国内政治关注，强化国家内部的团结，从而减缓国家内部的政治压力。《敌人论》告诉我们，作为最年轻也最强大的现代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自建国两百多年来，先后发动和领导了 240 多次大大小小的国际战争，以至于有人作出结论：“战争和敌人造就了美国”。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也因此相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其社会凝聚力往往会有所削弱，甚至会面临国家分裂和内战的危险。而当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威胁时，国家的权威和资源都会得到加强，国家内部的团结也会增强。

然而，值得关切和反思的是，因这类政治效应所带来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对“敌人”的政治利用，譬如说，出于夺取和巩固党派政权或者转移国家内部矛盾或政治压力的目的，政治家（更不用说政客了）和当权政府便可能

借用、挪用甚至盗用某种或某些普遍化的正当理由，或者以某种普遍社会道义的名义，有意图、有预谋地去建构甚至虚构“敌人”。敌人的确来自他者，或者敌人确实是从“政治之我们”中异化出去的他者，可这一逻辑推理反过来并不必然普遍有效：并非所有的他者、陌生者或异己者都必定成为“政治之我们”的敌人！行文到此，我突然想起美国的“绿卡”，英文全名为“permanent resident alien card”（直译“永久居住之外来者卡”）。在英文中，“alien”一词的主要意思是“陌生的”、“外来的”、“异己的（异化的）”。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外来者或“新来者”（所谓“the New Comers”）几乎是除印第安人之外所有美国人的原初身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非但不是最终也没有成为敌人，而且还依次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所以他们才会骄傲地喊出“我们之为人民”（“We, the People”，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哲学家、耶鲁法学院教授 Bruce Ackerman 之代表作的书名）。

如此看来，他者或外来者并不一定都是“政治之我们”的敌人，一如临时的利益共同体成员并不一定就是“政治之我们”的永久朋友。这促使政治哲学家（尤其是政治伦理学家）们必须注意：任何关于政治的哲学和伦理学思考，不能仅仅聚焦于敌友关系之间而无所超越，还必须考虑敌友关系之外的诸种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关系。人类的政治关系绝不是孤立的，也不仅仅限于敌友关系之单向度。与陌生人的遭际有可能是一种不幸，或许因此而增加一个真正的敌人；但也可能是一种幸运，或许因之而幸遇你或你们生命中又一位真正的朋友甚至贵人。人世间来来往往，步履匆匆，行踪飘忽不定，谁又能预定人生的遭际呢？人际如此，群际、族际、国际亦复如此。敌友关系之外，陌生人的遭际、常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甚至既有的敌对者之间，还有多少可能的关系？即便是敌友关系之间，谁又能担保所有既定的一切就一定是且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可以坐在一起举酒干杯；因为日本入侵，民族救亡压倒一切，蒋介石与毛泽东便能兄弟相称握手言欢。有时候，并非只有战争一类的重大事件才会给敌友关系带来这样根本性的改变，某种偶然的机遇或事件也会化敌为友或者化友为敌。比如说，古希腊特洛伊战争中的名帅阿伽门农与勇将阿喀琉斯之间的故事（《荷马史诗》之《伊利亚特》）。

如果从人类的“类意识”来看，更为复杂而具有终极意义的事情恐怕是

如何化敌为友？或者，如何最终消除敌人本身？这不单涉及政治宽容，从根本上说，还关乎作为人类的我们究竟如何共生共存、共处共享！

四、化敌为友如何可能？

《敌人论》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化敌为友”的问题。首先从“没有永远的敌人”之命题入手，进而“宽恕敌人”直至“爱我们的敌人”，以步步逼进的逻辑分析和例证辅助，尝试着解开“敌友关系”的死结。这一尝试是有价值的，但依旧留下了诸多开放的议题，需要展开更充分的深究。

受高山君研究的激发，我大致形成了一些基本上仅仅限于哲学范畴的解释，并期待对“化敌为友如何可能？”作出一个初步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的解答。如前备述，“敌人”和敌友关系意识最初且根本上源自利益矛盾或利益争夺。因之，敌人和敌友关系之紧张的消解最终取决于利益矛盾和利益争夺的止息。这显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学解释。可是，仅仅限于政治学的视域，这种消解是无望的，因为政治本身即是利益矛盾的产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因为敌人而有了政治，因为敌友关系而产生了对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在需求。

然而，换一个角度或进一步扩展到哲学的视域来看，敌人和敌友关系会有一种新的也许是更本原的理解。哲学自她在古希腊诞生起就建立起一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或方法，从“惊异”（wondering）于外部世界开始，到“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最初为铭刻于德尔菲神庙门楣上的箴言，尔后苏格拉底将之证成为一个最著名的哲学命题）的转折，主客二分几成哲学的信条，从此影响深远。至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将这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方法发展为一种系统完备的哲学方法论，成为西方思维模式的基本原理或原则。按照主客二分的认知原理，不仅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从自我主体出发的，而且这种主体意识同时也是主体存在及其意义的在先证明。笛卡尔的所谓“我思故我在”（“I think, so I am”）不单是一个认识论的主张，同时也是一种主体存在论的证明：作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生命存在，主体自我之思（“我在思想”）亦即主体自我之在（“我活着”）的明证。因而，自我主体的在先性逻辑预定不期然地蕴含了自我主体存在的优先性结论。于是，作为主体认知投射的客体，便随着他/她/它被对象化、客体化而被至于次

要、从属或与主体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位置。诚然，这并非主客二分模式的唯一推论，但却是一种较为自然的逻辑推演和逻辑结论，倘若它得到大量现实生活经验和实例的证实，则很可能成为人们习惯性的认知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依据。不幸的是，近代西欧早期的资本主义或商业社会的经济实践，既受这一思维逻辑的深刻影响，又以其现代经验事实给予这一思维模式以空前强力的实证支持。

于是我们看到，自16世纪开始，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欧洲便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利益争夺中，演绎了一场关于敌人和敌友关系变幻不居的多幕剧，或悲或喜，此起彼伏。先是荷兰与西班牙等国的海洋霸权争夺，后有英国海洋霸权的崛起，再是大英帝国的雄霸天下，继之便是德意志先后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最后促成大西洋彼岸美帝国的超级霸权……这其中，谁是谁的敌人？敌友关系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任何一种真实的解答都能构成一部充满鲜血、泪水和浩叹的现代社会断代史！马克思曾经凭借其资本分析，揭橥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初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冲突，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成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理论中独特的敌友关系镜像。马克思理论中的敌人主要还是“阶级敌人”，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阶级之间的敌友关系后来竟然演变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敌友关系，后者的紧张爆发不幸酿成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国家政治意义上的敌友紧张也扩张为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敌友决战。更为复杂的是，分属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在马克思看来完全异质的人类社会阵营的国家，因为民族战争而成为了战时的朋友，而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反而成了相互的敌人。两场世界大战特别是几乎波及整个地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全人类认识到了国际战争中的敌人与朋友并非不可改变，战争中的敌友关系张力远甚于阶级革命中的敌友关系，史无前例的战争暴力把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都投进了硝烟烈火，经受着极端严酷的炼狱，烤得一片焦淬。

于是，一些哲学家对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更加确信不移，甚至将之看作不可变更的人类关系定式，客体或者他人被赋予更加极端的否定性含义。比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便通过其剧本《间隔》中的人物喊出：“他人就是地狱！”把主体的“被注视”也就是“被客体化”视为人之主体性存在与自由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不过，另一些哲学家则开始反思